

Doi: 10.11835/j. issn. 1008-5831. rw. 2025. 09. 001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李振华,夏金玲.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历史考察[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181-190. Doi:10.11835/j. issn. 1008-5831. rw. 2025. 09. 001.



Citation Format: LI Zhenhua, XIA Jinling.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entral Red Army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J].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5(5):181-190. Doi:10.11835/j. issn. 1008-5831. rw. 2025. 09. 001.

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历史考察

李振华^{1,2},夏金玲¹

(1. 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茂名 525000;2. 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摘要:1934年底爆发的湘江战役,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之战。这场战役不仅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较量,还是人心向背的较量。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浴血奋战,以牺牲过半的巨大代价实现了渡江西进,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对红军突破湘江,实现西进战略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役期间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其必然选择,其一,红军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重大任务,这由其革命性质所决定;其二,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和红军大肆污蔑,桂北广大民众被蒙蔽、欺骗的情形下,红军开展群众宣传是揭露敌人阴谋,争取群众支持的重要方式;其三,红军强渡湘江需要各种条件,面对敌人的重重封锁,只有积极开展群众宣传,最大程度争取桂北各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帮助,才能使中央红军突破湘江,转危为安。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宣传内容,维护群众利益;选择灵活务实的宣传方式唤起民众,产生思想共鸣;严守群众纪律增强宣传效力,争取群众认同。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产生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一方面,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国民党反共宣传的负面影响,赢得了桂北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突破湘江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传播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策,启发了群众革命觉悟,播下了革命火种。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智慧和力量,既为党和红军在湘江战役及后续长征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党的群众工作、民族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群众宣传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5)05-018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湘江战役研究”(20JZD041);茂名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茂名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5GJ02);茂名市科技计划项目“虚拟仿真技术下红色文化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研究”(2025672)

作者简介:李振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讲师,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夏金玲(通信作者),博士,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Email:1074496232@qq.com。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惨烈、最悲壮、最为关键的一战,习近平总书记评价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1]。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中以巨大的伤亡代价,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歼企图,实现了西进的战略目标,这既有赖于中央红军指战员高于天的理想信念和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也离不开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能获得桂北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原因之一就是红军通过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戳穿了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歪曲宣传,加深了桂北群众对党和红军的了解,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充分发扬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的光荣传统,在与敌人激战和高强度行军的同时,积极开展对当地群众的宣传工作,取得了当地群众的信任和帮助,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经广西途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所进行的一场激烈的对敌作战。文中论述的湘江战役时间范围为1934年11月25日至12月8日,之所以这样界定,是因为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在发布的《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中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须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并要克服二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2]^[293]这一命令的发布标志着湘江战役的开始,命令指出的两大山脉即都庞岭、越城岭,两条河流即灌江、湘江。12月8日由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委主席朱德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布《我野战军继续西进及九日行动部署》,电文提到:“五、八军团应经黄洋河至东寨、水林冲地域,向城步警戒。”^[2]^[321]从电文可以看出,担任全军后卫的五军团也已翻过越城岭,标志着湘江战役结束。本文论述的群众宣传工作,是指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期间对桂北群众(包括当地汉族农民群众和被桂系军阀压迫的各少数民族民众)进行的宣传。

一、湘江战役期间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

(一)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红军肩负的重要任务

开展群众宣传是红军革命工作的重要内容。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要争取人民群众,必须向人民群众广泛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和宗旨。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宣传工作,他曾指出:“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3]“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

红军是一支执行党的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宣传群众是一项重要任务。1934年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指出,必须在沿途进行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广泛地进行口头宣传,散发和张贴宣传品。在墙上多写标语口号,特别要根据当地群众迫切的具体要求,提出斗争口号,领导群众斗争^[5]。这一要求表明中央红军高度重视在长征途中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宣传方式,还对宣传工作做了相关准备,比如印刷大量的宣传品,准备一些开展宣传工作的工具。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把印刷票子和宣传品的机器,以及印好的宣传品、纸张等都带上了^[6]。

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域后,就认识到他们将会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一开始在白色区域中得不到象苏区内那样的群众的热烈(拥护),甚至我们有时还会遭受到部分被欺骗群众的敌视,我们没有一个巩固的后方,可以安置我们的伤病员,可以取得我们人力、财力的有计划的补

充。”^{[7]396}想要解决这些困难,实现在白色区域的革命任务,红军必须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去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为此,《红星》报提出,“每一个红色战士应该是苏维埃基本政策的宣传者与鼓动者”^{[7]395},这就要求全体红军战士高度重视群众宣传,都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向白色区域的工农群众宣传苏维埃的主张,以发动工农群众进行斗争,争取沿途群众的拥护与支持。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期间的唯一一份“号外”,要求全体红军“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401}。由此可见,中央红军高度重视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中央红军在长征经过的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启发工农群众的革命意识,同时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如,“红3、8军团在汝城县热水圩、红1军团在汝城集龙圩、红3军团6师在宜章城都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红军的性质,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张贴大量宣传标语。汝城县境内现在还保留着147条红军标语”^[8]。《红星》报也记载了红军在宜章的群众宣传工作:“除了大量的散发与张贴传单、洗刷与图写标语外,还不断的进行了灵活的化装讲演,吸引广泛的群众来听我们的讲演。”^{[7]410}中央红军在经过湖南郴州时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情况,说明了中央红军不仅高度重视长征中对群众的宣传,而且积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主动践行自身肩负的宣传群众这一重要任务。

(二)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红军面临的斗争要求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大多是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区域,这些地方的群众较少接受到革命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不甚了解,长征沿途还有大量的少数民族群众,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更是知之甚少。此外,国民党污蔑、丑化共产党和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使当地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或敌意,对红军避而远之。所以,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不仅要面对严峻的军事斗争,还要应对复杂的舆论斗争。湘江战役的发生地桂北是国民党桂系的统治区域,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前,桂系军阀组建宣传队到桂北作防共宣传,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进行污蔑造谣,还胁迫群众躲避红军。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中校宣传科长的李文钊后来回忆说:“宣传队到了全州,对民团作了一次虚假讲话,叫他们不要害怕红军,把带去的宣传画、传单、标语张贴一通,并派裴代智一人去灌阳散发宣传品。”^[9]1934年11月29日的《新新新闻》报第2版记载:“划定兴安灌阳全州三县为战地区,昨已饬由飞机多架于侦察共匪侵桂当中,并散发传单,晓谕各该县民众。”^[10]国民党的虚假宣传引起了桂北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极大误解,甚至恐惧,当红军到来时,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跑到山上躲避。一些经历过湘江战役的桂北群众后来在采访中说:“红军来之前,乡公所、村公所派人到各村开会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红军来时,村子里的人都不在家,他们把东西如粮食等挑到山上藏起来,能搬的就搬走。”^{[11]424}“国民党到处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杀人放火,见人就杀,见妇女就抢。’所以,我们村里的人听见红军来,都躲上山去了”^{[11]426}。长征时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五团军医的钟有煌在《过湘江时安置伤员的故事》中说:“这些地方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和红军不甚了解,而且敌人造了许多谣言,群众有许多害怕的心理,初见红军时都逃到山里去,经过宣传和接触之后才逐步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12]206-207}原本敌我力量就对比悬殊,再加上敌人的造谣抹黑引起当地群众的恐慌和躲藏,导致中央红军进入桂北后的补充给养、寻找向导和实现突破湘江西进目标变得更加困难,面对这样的现实环境,湘江战役期间积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成为中央红军面临的必然选择。

显然,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既是启发当地群众的阶级意识和革命觉悟的政治任务,也是消除国民党对桂北群众虚假宣传产生的负面影响、深化桂北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正确认识以争取桂北群众支持和拥护的迫切要求。

(三)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是红军突破湘江西进的重要助力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广西后,即获取了国民党依据湘江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的情报,并充分认识到红军突破封锁线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中指出:“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2]293}为确保完成渡江西进任务,命令提出红军的政治工作人员要积极开展政治宣传与鼓动工作,其中就包括对当地群众的宣传,因为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粮食较缺乏,还要渡过两条河,在敌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的情况下,红军要保障后勤补给和创造渡河条件,少不了当地群众的帮助,要争取群众帮助,必须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

在国民党的重兵围堵之下,湘江战役过程非常惨烈,胜败已关系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生死存亡。1934年12月1日凌晨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名发出致红一、三军团的万万火急电,电文指出:“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2]313}突破湘江对中央红军实现战略转移的目标至为关键,红军最终突破湘江,离不开桂北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湘江战役期间开展群众宣传工作成为中央红军的必然选择,是打破敌人虚假宣传、争取群众帮助,从而突破湘江的重要方式。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面临的现实境况要求红军不仅要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而且必须开展好群众宣传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桂北各民族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认识,使党和红军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下,最大程度争取桂北各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帮助,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提供助力。

二、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特点

宣传工作是要通过传播思想理论或实际行动,达到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效果^[13]。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激烈作战和急行军情况下,要想实现争取当地群众支持和帮助的成效,除了继续运用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积累的宝贵宣传经验之外,还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一)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宣传内容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域继续革命,开展白色区域的群众工作与苏区时不同,红军总政治部在指导红军指战员开展群众工作时就强调:“应该注意战斗环境与任务的转变,及时创造新的工作方式。”^{[7]394}对白色区域的群众宣传工作,红军注重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宣传,避免使用抽象和空洞的宣传内容,因为“脱离当地实际情形的抽象的宣传鼓动,必然会变成没有内容的引起群众兴趣与斗争的空喊”^{[7]396}。长征中出版的第三期《红星》报针对白色区域群众的宣传工作提出:“首先从群众切身的利益开始,然后逐步进入到苏维埃基本主张的宣传,必须以最通俗的言语、极大的耐心,同群众接近,来启发他们的斗争。”^{[7]399}结合当地群众实际的宣传内容更容易取得宣传成效,中央红军在经过湖南开展白区群众宣传工作时就注意了解当地群众的疾苦,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积极开展宣传,争取当地群众加入红军队伍,“‘击’部七连十二日到白石渡游击时,很清楚的了解了当地群众被何键军阀压迫筑炮楼、修飞机场、修马路,弄得没有饭吃的痛苦,便抓住了群众的这些痛苦,进行宣传鼓动,结果不到一天就争取了七个工人自动加入红军”^{[7]413}。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期间,沿途写下了大量标语开展群众宣传,因国民党破坏及年久失保,《红一方面军长征过广西现存标语影集》^①共收集红军长征标语72条,在灌阳书写保留下来的标语就有45条。从内容来看,以反对“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阀反动统治为核心的标语有16条,以反对“修炮楼、修马路”为核

^① 该标语集1984年由桂林地委党史办和灌阳、兴安、全州、龙胜、资源五县党史办联合编制。

心的标语有8条。中央红军除了常规宣传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方针政策等内容之外,还因地制宜,结合桂北群众的切身利益制定宣传内容。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内容,针对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提出了“反对强占民田修马路”“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针对桂系军阀统治下横征暴敛的情况,提出了“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民众修炮楼”“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吸取民间现金”等口号;为争取瑶民和保护瑶民利益,中央红军提出了“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向瑶民抽税”“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强迫瑶民修炮楼、修马路”^{[11]128-131}。这些标语口号的宣传内容,完全是中央红军基于桂北地区特殊的社情民风制定的,切中当时当地的阶级矛盾,关注桂北地区群众的现实需求,维护群众利益,有利于争取当地群众的信任,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长征途中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工作,经过湘南的少数民族区域时,中央红军就开始积极开展对少数民族民众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时任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的赵鎔在《长征日记》中记载,1934年11月26日“军团政治部编印了红军告僮、苗、瑶族同胞书,并颁发了通令……要教育部队严格执行我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少数民族的工作。”11月27日占领江华县城后“我军团政治部编发的告僮、苗、瑶同胞书,七团战士们已贴得到处都是”^[14]。同在九军团的林伟在《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也记载1934年11月26日“军团政治部编印了红军告壮、苗、瑶族同胞书,并发了通令,江华、永明是壮苗族区域,教育队伍要注意政策和宣传”^[15]。在湘南编印的红军《告壮、苗、瑶族同胞书》,说明了中央红军开始重视开展民族工作和对少数民族民众的宣传。为了中央红军能够突破湘江、顺利通过桂北少数民族聚居区,湘江战役期间,红军总政治部结合桂北少数民族实际情况于1934年11月29日发布中国共产党长征途中民族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16],原则指示特别突出瑶族、苗族是为了争取以瑶族、苗族为主的桂北少数民族的支持。原则指示虽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但其所阐述的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具体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的基本方针要求对其他少数民族具有普适性,因而成为红军开展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

国民党新桂系军阀对少数民族实行压迫与歧视政策,导致民族矛盾尖锐,造成1932—1933年桂北瑶民大起义的爆发。新桂系镇压瑶民起义后,收缴瑶民枪械、强迫瑶民服役、强征税款,加重了桂北少数民族的负担。中央红军依据桂北少数民族的具体实际情况制定宣传内容,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主张、宗旨和民族政策等,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中央红军在宣传中提出“全体瑶民团结起来,扫平李宗仁、白崇禧”“反对李宗仁、白崇禧收缴瑶民的枪械”“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向瑶民抽税”“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压迫瑶民当后备队”“红军和瑶民是一家人”^②等口号。《对苗瑶民族口号》中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实行民族自决”“苗人的首领由苗人自己选举,不要国民党军阀委派”“苗人自己武装起来,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压迫屠杀”“反对李宗仁、白崇禧和何键对苗人(瑶人)的一切苛捐杂税和差役”^{[2]308}等口号,这些口号都是结合桂北地区少数民族民众的实际情况制定的,充分表达和维护了瑶、苗等少数民族民众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争取桂北少数民族民众的认同、支持和帮助。

(二)选择灵活务实的宣传方式唤起民众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由于经常处在行军进程中,在长征沿途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方式主要是散发和张贴传单、书写标语、化装演讲和召开群众大会。有时是多种宣传方式同时运用,相互配合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因为这些宣传方式不仅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而且受众面广、操作简单、便于推广。宣传工作主要在群众日常生活密集的地方进行,比如学校、寺庙、祠堂等公共场所,这些地方

^②《红一方面军长征过广西现存标语影集》收集的中央红军在灌阳开展群众宣传的革命标语保留下来的45条中有9条是关于维护少数民族民众利益的内容。

是当地群众的公共活动空间,人群较为集中,能最大程度地实现宣传效果。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处在激烈战斗和紧张行军中,宣传人员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到沿途经过的村庄和集镇开展群众宣传动员工作,这就要求红军灵活采用不同的方式向桂北的各族群众宣传党的宗旨和红军的政策。

在众多群众宣传工作方式中,最简单有效和广泛运用的宣传方式是书写革命标语。标语可以用简短有力的文字表达社会动员的主要思想,成为长征途中红军宣传群众的重要武器,被人民群众称为“指路的明灯”和“板壁上的指南”。为了做好群众宣传工作,发动群众斗争,1934年11月25日,红军总政治部通过长征中出版的第五期《红星》报号召红军进行写标语比赛,要求会写字的红军战士,每个人练习写熟一条至十条标语;每人每天写一至五条标语;可以用毛笔、炭笔、粉笔、石灰块等书写标语,字体大小皆可;在红军宿营地及大休息地的墙壁都要写满标语^{[7]409}。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期间更多地选择标语这一宣传方式,是由行军作战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因为接触群众的机会和时间有限,标语内容通俗易懂、书写简便,而且红军在特定场所书写的革命标语,使群众抬头能见、出门能见、走路能见,即使书写标语时现场没有群众,因群众经常出现在这些公共活动空间,这些标语始终可以发挥宣传作用。革命标语是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桂北开展群众宣传的重要载体,至今在桂北还保留很多通俗易懂、简短凝练的宣传标语。这些标语的内容深刻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广西时桂北地区的社会状况与问题,体现了桂北各族群众的利益诉求,对争取当地群众支援中央红军进行湘江战役和长征行军起了积极的动员作用,并在桂北地区传播了革命思想、撒下革命的火种。此外,这些保存下来的革命标语作为一种历史遗迹,是红色文化中不可磨灭的精神财富,同时,它们的分布状态也反映了中央红军长征过桂北的行军轨迹。

由于中央红军长征所经之地识字的群众不多,在群众宣传工作中,中央红军注重运用形象化的表达形式进行宣传。比如,位于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千家寺村的红军标语楼的墙上保存有一幅讽刺漫画。这幅漫画将“国民匪党”四个字巧妙地组成了一只狗的图案,把国民党作为帝国主义国家走狗的形象直观地表现出来,“国民匪党”的标语画旁写着“这个是李宗仁”几个字。这幅漫画是针对当地群众痛恨国民党桂系军阀残暴统治的宣传,使群众更容易理解宣传内容,留下深刻印象,并使民众憎恨国民党桂系统治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泄。

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还积极采用开群众大会、演戏、座谈会等宣传方式号召和发动当地群众。红军长征经过地的许多民众有深刻的记忆,如蒋成松回忆说,红军在石门村住了两天一夜加半夜,开了群众大会,红军在会上讲话^{[17]390};罗柏生回忆说,红军在界首关帝庙演过戏,演完戏就分猪肉给群众^{[17]400};唐德卿回忆说,红军在界首时把财主的粮食分给穷人,还在关帝庙组织召开了群众大会^{[17]420}。现在界首镇湘江边的红军街依然保存着中央红军当年召开群众大会和演文明戏的关帝庙^③。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根据具体情况采用灵活多变的宣传方式,有时多种宣传方式相互配合使用,有助于中央红军赢得当地群众信任和支持。

(三)严守群众纪律增强宣传效力

只有满足和维护群众的利益和需要,才能达到宣传效果。严守群众纪律,保护群众利益,是群众宣传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以严守群众纪律的实际行动增强群众宣传工作效力。

行胜于言,群众关注红军的宣传内容,更看红军的实际行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总政治部高度重视红军战士对群众纪律的遵守,中央红军长征后不久,《红星》报在对红军指战员的宣传中,就特

^③ 在兴安县界首镇湘江战役遗址实地调研中,发现位于界首镇红军街的关帝庙简介中提及了中央红军湘江战役期间在此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简介指出:“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湘江抢渡界首渡口时,曾在此演文明戏,向老百姓宣传革命道理。此后,庙由于年久失修倒塌,2016年由国家文物局拨款修复。”

别强调严格遵守群众纪律是密切军民关系的首要工作：“没有纪律的部队,一切宣传鼓动工作,都不会引起群众对我们的同情与拥护！”^{[7]400}一个没有纪律的部队不但不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还会遭到群众的反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红军践行宣传内容的重要保证。由于白色区域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了解,再加上国民党污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虚假宣传,造成群众对红军的畏惧心理,这就必须要做到对群众宣传的言行一致,既要进行宣传解释又要执行严格纪律,“红军所到的地方,如有群众畏惧而逃跑的,则必须动员红色战士及政治工作人员到附近山上去进行宣传解释工作,使他们回家,同我们亲近。只有红军的高度觉悟与阶级纪律的模范,才会造成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与敬爱”^{[7]400}。考虑到群众纪律在红军长征中获得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重要性,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发行“号外”,号召红军战士争做群众工作的模范,对红军的群众纪律提出了具体要求:“(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东西要赔偿,借群众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便乱屙屎,宿营时掘厕所。”^{[7]401}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高度重视遵守群众纪律,通过报纸宣传向红军指战员阐释了群众纪律的重要性以及红军群众纪律最低限度的具体要求,从而为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严守群众纪律提供了根本遵循。

在当地群众的访谈回忆中有很多具体事例体现中央红军以实际行动关心和维护群众利益,以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一,把打地主、打土豪没收的粮食、财物分给当地群众。家住兴安县金石乡文家洞的盘成万说:“红军对穷人好,对土豪却不客气。他们杀了土豪的猪,开了土豪的仓,把猪肉和粮食分给穷人。”^{[17]402}其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吃了群众的东西一定会付钱,宿营之后打扫干净卫生。家住全州县石塘圩的陈业正在采访中曾说:“红军纪律很好。我有一个房族的祖父养了五头各两百多斤的大肥猪,原是准备讨媳妇用的。红军来了,他天天念着‘靠菩萨保佑,红军莫杀我的猪’。红军了解到他家不是土豪,连他家的门都没有进去。”^{[17]423}其三,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看病不收钱,灌阳县水车村农民翟顺修老人说:“他说不要钱,红军是为老百姓看病的,叫我跟他去拿药。”^{[17]418}

中央红军以严明的群众纪律、爱民的实际行动,使当地群众逐渐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中央红军以文明之师、正义之师的良好形象,使当地群众消除了对红军的疑虑与恐惧,桂北当地群众不再害怕红军,躲出去的群众也陆续回到家中,正如当地群众后来说,红军来时,他们都跑到山上躲避,后来看见红军的纪律好才下山回村,因为群众不在家,红军就在屋檐下睡,不进屋^{[17]421}。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每到一地,除了对当地群众进行文字和口头宣传外,还通过严守群众纪律、积极帮助群众、维护群众利益的方式对当地群众进行实际宣传。

三、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群众宣传工作的历史作用

(一)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为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创造良好的群众基础

开展群众宣传工作,能够增进白色区域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获得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陈云认为红军之所以能突破重围,除了作战英勇之外,还在于深得民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之所以深得民心,群众宣传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如红军入湘南时,资兴、郴州、宜章一带,为昔年毛泽东、朱德久经活动之区域,居民受共产党之宣传甚深,故见红军此次复来,沿途烧茶送水,招待红军”^[18]。

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的群众宣传工作,打破敌人的欺骗宣传,使桂北各族群众打消了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和畏惧心理,加深了对党和红军的认识及信任,不再相信国民党的反共宣

传,从而赢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湘江战役期间桂北各族群众给红军提供了许多帮助,包括帮红军磨米、送饭,帮红军架桥、带路,救护红军伤病员,收留、照顾掉队红军。群众的支持和帮助在中央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江西进的战略转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桂北群众在湘江战役期间帮助中央红军解决物资补给困难问题。国民党新桂系为了削弱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要求桂北各族群众躲起来并把粮食藏起来,断绝红军的物资补给,灌阳县“水车村长翟运军带着一个村警,到处威胁群众,要我们把粮食藏起来后,赶快到山上去躲,说是红军来了”^{[17]418}。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通过开展群众宣传,并以严格的群众纪律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红军是工农群众的军队,从而获得了当地各族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使部队给养基本得到解决。中央红军过灌阳时,曾有30多名红军指战员到河成乡滕家湾住,“该村的瑶族妇女奉小妹、奉九妹,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工农红军,并拿出粮食解决他们的困难”^{[19]13}。还有群众积极帮红军磨米,给红军送水送饭,“我给红军一个部队磨米,共磨了两天……村上还有一些人也帮红军磨过米,找过青菜”^{[17]389},“红军和敌人打仗期间,我一直帮红军磨米,还给他们送吃的”^{[17]446}。

桂北群众积极帮助红军架桥,给红军带路。群众把船、门板借给红军,并和红军一起搭设浮桥,“红军在文市架桥时,我们村去了五十多人”^{[17]397},“红军在界首的湘江架了浮桥,架桥时我帮红军扛过木板”^{[17]400},“红军这样好,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他们。我看到很多红军扛着木料往江边走,一打听,原来是准备架桥过江。我急忙跑回去,把家里的大桌子、门板都扛来给他们架桥用”^{[17]419}。还有群众给红军当向导,为红军带路,使红军少走了很多弯路。红军经过全州县的聂家村时,请村民聂昌善带路,直到把红军顺利送到目的地后他才返回家^{[17]398}。

桂北群众救护红军伤病员,收留、照顾掉队红军。湘江战役新圩阻击战中,红五师在当地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在附近的下立湾村蒋氏祠堂设立临时战地救护所。在激烈战斗中,下立湾村和附近村里的一些群众主动前往临时救护所给红军送饭,还有群众帮助红军抬运伤员。中央红军突破湘江转移后,有不少因伤病无法继续行军以及其他原因掉队落伍的红军战士,面对国民党的搜捕,桂北群众冒险救护红军伤病员和掉队落伍战士。“我们村收养三个红军”^{[17]407},“红军长征那年,我父母救护了两个红军伤员”^{[17]416}。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有不少伤病员由于跟不上部队滞留在了桂北,得到当地群众的收留和照顾,“一两百伤病员在兴、全、灌一带,群众把他们安置下来”^{[19]13}。

(二)传播了共产党的革命宗旨和政策,启发了群众革命觉悟,播下了革命火种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长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20]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召开的庆祝大会上说:“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种子。”^[21]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开展的群众宣传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革命宗旨和政策,启发了桂北群众的革命觉悟,支援了桂北各族群众的革命斗争,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中央红军不仅对长征沿途各民族群众进行革命宣传,还大力支持他们的革命斗争。桂北地区的瑶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但瑶民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并没有消除。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桂北时重视民族问题,积极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瑶民领袖凤福山于是派人和红军联系,表示愿意联合红军。红军热情接待了瑶民代表,并诚恳地表示“愿意和他们联合,说明了我们的主张,指出了他们苗家的出路,说明我们是来帮助他们打倒汉官财主,替他们求解放的”^{[12]344}。为了做好桂北的民族工作,更好地向少数民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红军总政治部在湘江战役期间发布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原则的指示》明确提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民族平等,给瑶民彻底的民族自决权。”^{[2]306}这鼓舞了少数民族群众坚持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

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的群众宣传工作,大大提高了桂北各族群众的阶级觉悟,不少当地青年

群众主动参加红军队伍,组建游击队。“当场就有好几个苗、僮族兄弟参加了红军。同时又成立了苗、僮兄弟自己的游击队”^[22]。中央红军经过全州县凤凰乡学里村,当时只有17岁的蒋授理立即参加了红军,“红军来时,他正在放牛,丢下鞭子就跟红军走了”^{[17]399}。在全州县,中央红军通过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吸引了不少青年参军,“全县加入红军的达七十人”^{[11]52}。

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转移后留下来的武器成为桂北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装备。陆英钟老人曾回忆说,红军在离开前,召开了群众大会,鼓励群众起来斗争,会后,送给他们六十多支步枪、数百发子弹以及几十个马尾手榴弹。日寇入侵灌阳时,他们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用红军送给他们的枪弹,多次与日军作战^{[17]417}。湘江战役期间中央红军在桂北播下的革命火种,为党在广西的革命斗争和建立革命政权奠定了基础。解放战争时期,桂北各族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参加游击队,发动武装起义;桂北群众还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创建人民政权,桂北创建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就在中央红军长征走过的龙胜县。

参考文献:

- [1] 张晓松,朱基钗,杜尚泽.“加油、努力,再长征!”——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纪实[N].光明日报,2021-04-29(01).
- [2] 田玄,陈宇.湘江战役史料文丛:第2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96.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6.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85.
- [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M].4版.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171.
- [7] 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M].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14.
- [8] 中共郴州市委党史办.中国共产党郴州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143.
- [9] 广西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新桂系纪实续编(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359—360.
- [10] 田玄,范国平.湘江战役史料文丛:第9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259.
- [11] 中共桂林地委《红军长征过广西》编写组.红军长征过广西[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
- [12] 田玄,张侃.湘江战役史料文丛:第4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13] 单连春.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宣传工作思想及其启示[J].江海学刊,2016(6):62—68.
- [14] 赵容.长征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168—169.
- [15] 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60.
- [16] 阳勇.《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历史地位与作用考论[J].广西社会科学,2021(11):152—157.
- [17]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
- [18] 陈云.随军西行见闻录[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5:7.
- [19]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20]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
- [21]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6.
- [22] 戴镜元.长征回忆:从中央苏区到陕北革命根据地[M].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28.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carried out by the Central Red Army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LI Zhenhua^{1,2}, XIA Jinling¹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Petrochemical Technology, Maoming 525000, P. R. China;

2.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at broke out at the end of 1934 is a decisive battle for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is battle is not only a milit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but also a contest of popular support. The Central Red Army fought bravely in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sacrificing more than half of their liv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rossing the river and advancing westward, shattered the Kuomintang's attempt to encircle and annihilate the Central Red Army east of the Xiangjiang River.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breaking through the Xiangjiang River and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goal of advancing westward.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it wa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the Red Army to carry out mass propaganda work. Firstly, the Red Army bore the significant task of propagating, organizing, and arming the masses, which is determined by its revolutionary nature. Second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Kuomintang's extensive slander against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Red Army, and the deception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in northern Guangxi, the Red Army's mass propaganda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expose the enemy, win over the masses, and help achiev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Xiang River. Thirdly, the Red Army's forced crossing of the Xiang River required various conditions. Faced with the enemy's heavy blockade, only by actively carrying out mass propaganda, and striving to gain the understanding, trust,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northern Guangxi to the greatest extent possible, can the Central Red Army break through the Xiang River and turn danger into safety.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was formulated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masses; Choose flexible and pragmatic propaganda methods to awaken the public and generate ideological resonance; Strictly abide by the discipline of the masses,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paganda, and strive fo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masses.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had a positive historical impact. On the one hand, it expand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to some extent eliminat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Kuomintang's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won the support and assistance of various ethnic groups in northern Guangxi, and created a good mass foundation for breaking through the Xiangjiang River. On the other hand, it spread the revolutionary purposes and policies of the CPC, inspired the masses' revolutionary consciousness, and sowed revolutionary kindling. The mass propaganda work of the Central Red Army during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reflected the wisdom and strength of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which not only provided strong support for the CPC and the Red Army in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and the subsequent Long March, but also accumulated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the CPC in mass work and national work.

Key words: the Battle of Xiangjiang; the Central Red Army; mass propaganda

(责任编辑 周沫)